

彰显宏观经济治理的理论自信

○ 陈彦斌

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中国特色的宏观调控体系为此发挥了重要作用。立足这一实践基础,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不断探索宏观调控新理念,逐步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作为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重要内容,宏观经济治理是对宏观调控理念和实践模式的重大创新,是党的创新理论的标识性概念,也是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标识性概念,集中反映了新时代党对经济工作规律的深刻把握。

宏观经济治理的提出及实践演进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宏观调控体系不断完善,有力支撑了经济长期快速发展。这一体系既包括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等短期需求管理工具,也涵盖产业、区域、投资、消费等多类经济政策,形成目标多元、工具多样、协同联动的调控框架。随着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国内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传统宏观调控方式面临一系列新挑战。复杂的内外环境下周期性、结构性、体制性矛盾相互交织,需求侧与供给侧冲击相互叠加,政策目标日渐多元化,导致少数工具难以兼顾多目标;居民消费占比偏低、财税金融传导不畅等深层次问题可能削弱政策效能,亟需通过体制机制改革加以破解;人工智能等革命性技术催生新质生产力,也给宏观调控提出新要求。推动宏观调控向宏观经济治理拓展提升,正是党中央立足新发展阶段作出的重大战略抉择和重要理论创新。

2020年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提出“宏观经济治理”,要求“完善宏观经济治理体制”“进一步提高宏观经济治理能力”。宏观经济治理涵盖宏观经济政策、地方政府经济治理、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机制以及改善政策效果的改革举措等。这意味着我国宏观经济的治理理念从侧重于政策工具操作的“宏观调控”,升级为立足国家治理高度进行系统谋划的“宏观经济治理”。

“十四五”时期,宏观经济治理体系在实践中不断健全,其内涵持续深化。“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强调“完善宏观经济治理”,并将其作为“提升政府经济治理能力”的首要内容,明确“健全以国家发展规划为战略导向,以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为主要手段,就业、产业、消费、环保、区域等政策紧密配合,目标优化、分工合理、高效协同的宏观经济治理体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从制度层面强调“科学的宏观调控、有效的政府治理是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优势的内在要求”,提出“必须完善宏观调控制度体系,统筹推进财税、金融等重点领域改革,增强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这一系列部署标志

着宏观经济治理的理论深化和实践探索进入新阶段。

“十五五”规划纲要对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提出了新要求。主要有四点。一是推动形成新的经济发展模式。“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提高宏观调控和政府治理水平,促进形成更多由内需主导、消费拉动、内生增长的经济发展模式”。宏观经济治理要着眼于系统性重塑经济发展模式,注重构建依托国内超大规模市场、消费基础作用和创新内生动力的新增增长路径。二是完善宏观调控目标体系。“十五五”规划纲要要求“完善宏观调控目标体系,统筹短期目标和中长期目标、总量平衡和结构调整”。这意味着要形成短期稳定、长期增长、结构优化三大类目标协同并进的治理格局,相应地,需统筹强化稳定政策、增长政策、结构政策的协调配合,实现宏观政策“三策合一”。三是提升宏观经济治理效能。“十五五”规划纲要将“提升宏观经济治理效能”作为明确要求,并与高质量发展综合绩效考核挂钩。在实践中,要把制度建设与效果检验结合起来,把制度优势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四是将预期管理纳入全过程。“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健全预期管理机制,将预期管理纳入宏观经济治理全过程”,超越了西方预期管理仅限于货币政策领域的做法,将预期管理升级为贯穿治理全链条的基础性制度安排。

把握标识性概念的重要特征

各学科的标识性概念和原创性理论是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主干支撑。“宏观经济治理”具有主干性、原创性、实践性、引领性等标识性概念所应具备的特征,是党的创新理论引领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聚焦中国式现代化建设重大实践问题所形成的重要理论结晶,充分彰显了党的创新理论的科学性和引领力。

一是具有显著的主干性。在西方宏观经济学中,宏观政策与经济增长等少数概念居于主干地位,分别从通过政府政策实现经济金融稳定和通过有效市场实现资源最优配置两个维度支撑起学科框架。“宏观经济治理”并非对西方“宏观政策”的简单替换,它意味着从“被动调控短期波动”转向“主动建构治理体系”,在目标维度、工具种类、协调机制和政策逻辑上均有根本性差异,是对宏观政策范畴的整体性升级。正是依托这一主干概念,中国宏观经济学得以将分散的政策实践系统化和理论化,构建起逻辑自治的学科体系,进而形成宏观经济学领域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

二是具有突出的原创性。长期以来,

西方宏观政策理论聚焦于“市场失灵—政府干预”逻辑,政策目标与工具相对单一。“宏观经济治理”立足多重目标和多重约束的复杂现实,是一个融合目标协调、工具组合和主体协同的整体性框架。它以国家发展规划为统领,形成“规划引领、政策协同、制度保障”的治理框架,涵盖治理目标、主体、工具与协同机制。而且,它突破了总需求管理的传统理论缺陷,强调供给与需求两侧协同发力、动态匹配。这在理论基础、政策目标和治理范式上均形成了新的理论表达,超越了西方以短期总量调控和需求管理为核心的理论范式。

三是具有坚实的实践性。宏观经济治理既源自党领导经济工作的制度安排,也植根于中国应对增速换挡、外部冲击等现实挑战的丰富经验。从制度安排来看,无论是制定和实施五年规划,以中长期战略引领宏观走向,还是成立中央财经委员会,强化跨部门、跨周期的顶层协调,抑或是地方党委主要负责同志亲自抓经济工作,都有利于确保中央决策部署落地见效。从应对冲击来看,国际上日本、韩国在高速增长后均出现增速急剧下滑与大幅波动,而中国从高速增长阶段平稳过渡到当前中高速增长格局,这得益于区间管理、定向调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等宏观经济治理框架下的创新举措。同时,在疫情冲击下,宏观经济治理体系展现出强大的应变能力 and 调控效率,中国成为2020年全球唯一实现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这些实践有力证明,“宏观经济治理”是经得起实践检验的理论创新。

四是具有强大的引领性。知识层面,它引领相关领域将中长期规划、结构政策、风险防控、跨周期设计等系统地纳入分析框架,能够带动形成一套更加综合、更能回应复杂现实的知识体系。理论层面,它强调系统观念,引领形成多重目标动态平衡、供给需求双向发力、国内国际统筹协调等新命题,为构建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提供支撑。方法层面,它突破西方宏观经济学以动态随机一般均衡理论为基本方法论的局限,能够引领探索基于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分析工具,通过数据驱动和复杂系统建模拓展传统方法边界,从而形成更加适应超大规模经济体治理需要的方法论体系。

处理好四个关系提升治理能力

完善宏观经济治理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只有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短期与长期、供给与需求、政策与改革这四个关系,才能不断提升治理的前瞻性、针对性和有效性,最终形成市场机制有效、微观主体有活力、宏观调控有度的良好局面。

第一,坚持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相结合,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市场与政府各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二者应有机统一、相互配合。科学的宏观调控与有效的政府治理是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优势的内在要求。必须坚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让价格、竞争等机制充分生效。必须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政府要通过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和提升宏观经济治理效能,弥补市场失灵、规范市场秩序并防范风险。

第二,统筹逆周期调节与跨周期调节,处理好短期稳定与长期发展的关系。短期稳定关乎经济健康运行和民生福祉,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直接体现。必须运用逆周期调节平抑经济波动,维护社会大局稳定。同时,经济政策不能仅局限于应对短期波动,还要锚定中国式现代化宏伟目标,着眼长远、预留政策空间。因此,宏观经济治理要发挥其前瞻性与连续性的优势,实现短期稳定与长期发展的有机统一,尤其是要用中长期规划指导经济社会发展,保持国家战略的连续性和稳定性,确保一张蓝图绘到底。

第三,推动供需动态平衡,处理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需求侧管理的关系。当前我国经济运行面临的矛盾既有供给侧因素,也有需求侧因素,二者相互交织,不能割裂看待,必须推动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良性循环。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能够有效淘汰落后产能、优化产业结构、提升产品供给质量,增强供给体系对国内需求的适配性。加强需求侧管理能够改善总需求结构失衡,持续释放居民消费潜力,形成对供给侧的牵引作用。因此,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要求供给和需求两侧协同发力、动态匹配。

第四,强化改革举措与宏观政策协同,处理好宏观政策实施和深化体制机制改革的关系。一方面,要适度加大宏观政策实施力度,为改革创造良好的宏观经济环境。增强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和有效性,使各类政策措施同向发力、形成合力。加强财政、金融、就业、产业等政策协同,深入挖掘政策结合点,创新实施工具,持续放大“组合拳”效应。另一方面,要用改革的办法打通经济循环的卡点堵点,将政策效果转化为经济内生增长动能。其中既要深化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也强调加快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推进资本市场投融资综合改革等。在发展中,只有坚持改革举措与宏观政策的有效协同和良性互动,才能更好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宏观治理层面的坚实保障。(原载《经济日报》2026年5月19日第10版)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宣传阐释

守护历史文脉 赋能城市发展

○ 杨霞

文化遗产承载着一个民族的精神基因,是连接过去、现在与未来的桥梁。新时代以来,我国将文化遗产保护提升到前所未有的战略高度,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十五五”规划建设更是对文化遗产保护的具体工作提出了清晰、可操作的部署。新时代咸宁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与创新性传承的探索实践,不仅是响应国家文化强国战略的必然要求,更是关乎地域文明存续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命题。

一、新时代咸宁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与创新性传承的紧迫性与重要性

1、响应国家战略的使命驱动。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将“推动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纳入国家治理现代化框架,标志着该项工作已入专项管理提升至文化强国建设的战略高度。对咸宁而言,其紧迫性首先体现为政治对标与制度建构的刚性要求。国家强调“统一监管督察”,亟须破解传统保护模式中条块分割、监管乏力的困境。咸宁文化遗产类型多元,必须通过建立跨部门协同机制与全周期监管体系,推动系统性保护理念落地为制度实践,任何迟滞都可能形成保护盲区,造成不可逆的损失。其重要性,正在于承担起赓续地域文明的历史责任。咸宁的商周青铜戟、三国赤壁古战场、万里茶道遗存等,是构建中华文明标识体系的地方物证。对其进行系统性保护与深度阐释,既是参与国家文明叙事、增强文化自信的使命担当,也是为“讲好中国故事”奠定基层根基的关键举措。

2、应对本体危机的迫切抢救需要。文化遗产具有不可再生性与活态流变性双重特征,面临自然衰变与人文语境变迁的双重挑战。咸宁文化遗产保护的现实紧迫性,集中体现为“抢救性”干预的客观必要性。大量古建筑存于安全隐患,部分非遗项目因传承人老龄化而濒危。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的推进,进一步凸显了对既有资源精准评估与及时保护的窗口

期。其重要性深植于维护文化生态完整性的深层价值。文化遗产是一个有机的生态系统,物质遗产与非物质遗产相互依存,咸宁的桂花文化、桥文化、提琴戏等共同构成了独特的鄂南文化生态。系统性保护旨在避免文化基因谱系的断裂;而创新性传承则通过“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使文化遗产的价值理念与审美情感融入当代生活,实现文化基因在新时代的“活化”延续,这是维系地方文化认同与精神归属的根本支撑。

3、赋能区域振兴的内生需求。在高质量发展阶段,文化遗产作为重要的文化资本与精神资源,其转化效能直接关系到区域发展的软实力与可持续性。咸宁发展的紧迫性在于,必须快速将文化资源转化为高质量发展动能。在文旅融合深度竞争的背景下,若不能通过科技赋能、业态创新对三国文化、万里茶道等核心IP进行现代转译,则难以形成具有市场竞争力的文化产品与服务。其重要性体现在多维度的综合赋能效益。经济层面,可驱动文旅消费、带动特色产业与社区就业,践行“以文塑旅、以旅彰文”;社会层面,通过文化惠民活动与公共空间营造,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水平;治理层面,挖掘文化遗产中的优秀传统,可为基层社会治理与精神文明建设提供丰厚滋养。因此,这项工作是为中国式现代化咸宁实践注入深层文化动力、实现“人城业”和谐共生的关键路径。

二、新时代咸宁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与创新性传承的生动实践

1、构建“保护优先、系统治理”的防护体系,筑牢安全根基。一是坚持把保护放在第一位,严格遵循“最小干预”和真实性原则。对三国赤壁古战场遗址进行整体性保护与内涵挖掘,使其超越军事地标成为智慧文化象征;对羊楼洞古镇实施“修旧如旧”的抢救性修缮,修复包括羊楼洞明清石板街在内的历史建筑,并恢复有着深厚底蕴的传统青砖茶制作工艺,全方位推动羊楼洞砖茶文化系统于2014年入选

第二批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这也是湖北省首个传统农业系统获此殊荣;对古桂花树群落采取设置保护围栏、实施科学监测等精准措施,维护其自然形态,实现对活态遗产的原真性保护。二是通过立法、规划、协同、参与四重机制构建系统性保护格局。立法上,颁布实施《咸宁市古民居保护条例》提供法治保障;协同上,建立省、市、县多部门联席会议与会审制度;参与上,形成“政府主导、村民自治、社会参与”模式,多渠道争取多元资金支持。三是强化科技赋能支撑,提升精准防护能力。积极运用现代科技手段,筑牢文化遗产的“数字屏障”。通过无人机航拍、三维激光扫描技术对摩崖石刻、古建筑群进行高精度数字化建档,实现了预防性保护;利用AR技术、在线数字平台实现文物场景展示与云端呈现;对木雕、青砖茶制作等非遗进行全过程数字化记录并建立档案库。这些举措不仅提升了文化遗产保护管理的精准性,也打破了文化遗产展示传播的时空限制。

2、探索“活态传承、以人为本”的传承路径,激活社区与个体内生动力。一是扎根社区,构建“见人见物见生活”的传承生态,让文化遗产的创造者与持有者成为保护与发展的核心主体。如在羊楼洞古镇等历史街区,支持原住民在修缮后的老宅中继续生活与经营,使传统茶铺、民宿与工艺展示成为日常文化场景。文化遗产从“博物馆展品”转化为可感、可参与的“生活风景”;居民从“守护者”转变为“利用者”与“受益者”;游客则能沉浸式体验历史氛围,实现深度文化消费。这体现了保护传承与改善民生福祉的紧密结合,让文化遗产空间成为充满生命力的有机体。二是衔接代际,在创新实践中确保文化基因永续。面对传承人老龄化等挑战,咸宁着力构建覆盖多年龄段的立体化传承链条。在教育端推进“非遗进校园”、开设趣味课堂,开展非遗研学,让青少年近距离感受技艺魅力;在社会层面通过举办“非遗少年说”“蟾宫折桂”古树认养等活动,广泛吸引年轻一代参

与,让他们在家乡留下文化牵挂。这种传承体系注重通过跨界创新,将文化遗产转化为凝聚价值共识、促进产业发展的宝贵资源。

3、以“创新融合、战略赋能”推动转化利用,释放文化遗产时代价值。通过创新性转化与战略性发展,将文化遗产资源转化为驱动区域振兴的现实生产力。一是深化文旅融合,以“文物主题游径”为载体融合串联分散资源。如,“三国赤壁文化游径”串联古战场、博物馆等节点,配套智慧导览系统;“万里茶道咸宁段游径”以羊楼洞为起点,连接新店古镇码头、黄盖湖等历史地标,沿途设置茶文化体验馆驿站,使游径成为移动的历史课堂。同时,推动非遗工坊进景区,开发桂花、青砖茶等特色文创产品,带动旅游消费与社区就业。二是深入挖掘文化遗产的深层价值并对接国家战略。以赤壁三国文化为核心,通过举办国际论坛、组织海外展演等方式,传播其蕴含的智慧谋略文化;作为“万里茶道”重要节点,积极参与跨国联合申遗与国际合作。将地方遗产提升至中华文明标识和中外文明互鉴的高度。这一实践既展现了以文化遗产促进文明对话的开放格局,也是践行全球文明倡议、服务国家文化战略的地方行动,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持久的文化动能。

文化遗产保护是一项“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事业,“像爱惜生命一样保护好文化遗产”,就是守护中华民族的根与魂。咸宁的实践,构建了从战略部署、系统保护到活态创新与融合发展的完整闭环,不仅是履行守护荆楚文脉的历史责任,更是将文化传承深度融入增长极建设全局。通过系统性保护与创新性传承,让沉睡的文物与古老的技艺“活”在当下,“火”在生活,最终实现守护城市记忆、留住美丽乡愁、创造古今交融美好生活的目标,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深沉而鲜活的文化力量。

(作者单位:湖北科技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本文系湖北科技学院2023年教学研究项目,2023XY028。)

党校之声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正确政绩观要求我们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通过科学决策和实干苦干,创造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真正造福人民、得到群众公认的业绩。这一重要论述深刻揭示了实事求是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必然要求,也是检验政绩观正确与否的重要标尺。

实事求是,要求我们想问题、作决策、办事情,要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是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根本要求。辩证唯物论主义认为,物质决定意识,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意识是客观存在的反映。这要求我们想问题、办事情要坚持从客观存在的实际出发,既回避矛盾也不掩盖问题,既不夸大也不缩小,客观地认知和解决问题。站在“十五五”开局之年,一方面,我们要准确把握咸宁打造武汉都市圈绿色发展重要增长极的目标定位,全面分析咸宁发展的底气 and 优势,深刻理解绿色是咸宁最鲜亮的底色和本色,区位优势、生态良好、人文厚重是咸宁发展的天然禀赋,产业基础、改革成果是咸宁实现赶超跨越发展的有力支撑;另一方面,也要清醒认识咸宁高质量发展面临的不足和短板,经济体量能级偏小、产业结构不够优化、城乡基础设施滞后等问题依然存在,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仍然是我们面临的最大实际。只有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用全面、辩证、长远的眼光看待发展中的机遇和挑战,才能更好做到解放思想、敢于创新、真抓实干,以严谨细致的作风实现实实在在的增长和发展,为推动咸宁高质量发展积蓄更强劲动能、拓展更广空间。

实事求是,要求我们按规律办事,在实践中检验和发展真理。按规律办事,是中国共产党人坚持实事求是的鲜明体现。只有把政绩植根于“规律”的土壤,尊重规律、遵循规律,才能使政绩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的检验。按规律办事,要深入探索规律。领导干部为官一任、施政一方,要采取“入山问樵、入水问渔”的求实态度,把情况摸清、把问题找准,从纷繁复杂的表象中发现事物内部存在的必然联系,找到阻碍经济发展的痛点、堵点、难点,找到群众关切关注的急难愁盼问题,使发展思路、政策、方案有的放矢,有效破解问题、回应期盼。按规律办事,要充分尊重规律。解决咸宁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要遵循经济社会发展规律,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决不急躁就章、竭泽而渔、唯GDP的道路;同时,要因地制宜,承认客观差异,把上级部署和指导与咸宁实际结合起来,善用“一把钥匙开一把锁”的工作方法,蹄疾步稳走出适合自身特点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按规律办事,要坚持发展眼光。面对发展中的问题,要以发展的眼光看待,以发展的办法破解。这要求我们摒弃花样翻新形式主义,深入实际、深入群众,扎扎实实地做好调查研究工作,自觉用党的创新理论观察新形势、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不断增强问题的预见性,练就按照客观规律推进各项工作的真本领。

实事求是,要求我们科学决策、苦干实干,创造群众满意的政绩。科学决策是政策实施的逻辑起点,是推动事业发展的坚实支撑。决策得当,事半功倍;决策失误,事倍功半。衡量决策是不是科学,根本看是不是得到人民群众赞成和支持,是不是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现实中一些领导干部,不乏为民办事的热情,却没有干出群众满意的政绩,究其原因,就在于没有深入了解群众所思所想所忧所盼,忙错了方向、抓错了地方。因此,我们在工作中要多一些“脚步轻、脚印深”的调研,吃透上情、摸清下情、把握内情、了解外情,把真实情况掌握得更多些,把潜在风险预估得更充分些,坚决防止和纠正拍脑袋决策、拍胸脯表态、拍屁股走人的“三拍”现象。苦干实干,是干事创业的态度和精神,是把决策转化为成效的基本路径。践行实事求是的正确政绩观,关键在实干、落在实效。我们要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始终保持战略定力、工作韧性,聚焦体现咸宁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聚焦做好招商引资、项目建设、产业发展三篇文章,用小我成就大事、用小我成就大我,多做打基础、利长远的事情,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推进增长极建设取得更多实质性成果,真正做到兴一方经济、富一方百姓、建一方文明、保一方稳定。(作者单位:中共咸宁市委党校)

理论前沿

体育消费向“卖服务”转变

在不久前召开的第六届中国国际消费品牌博览会上,一批融合智能戒指、运动芯片、AI教练机器人的体育产品备受瞩目。这些新品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运动装备,而是悄然改变着人们参与体育的方式:智能戒指无感监测身体数据,运动芯片精准记录每一次击球,AI教练提供个性化训练方案。这背后体现了体育消费从“卖产品”向“卖服务”、从赛场消费向生活日常消费的深刻转型。

近年来,我国体育消费呈现高速增长势头。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限额以上单位体育娱乐用品类零售额同比增长15.7%,成为居民消费升级的重要风向标,远超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7%的平均水平。目前,扩大体育消费还存在一些制约因素。例如,优质服务供给仍显不足,部分消费场景同质化明显,中小体育经营主体融资难、成本高,等等。接下来,应从深化业态融合、强化数字赋能、优化政策供给、繁荣赛事经济等方面精准发力,充分挖掘体育消费潜能。(本报综合)

坚持实事求是 是正确政绩观的鲜明底色

○ 施亚平